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梵学论集

黄宝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梵学论集

黄宝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学论集/黄宝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1774 - 3

I. ①梵… II. ①黄… III. ①梵—文集 IV. ①B3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4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85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代序

跋涉在梵学之路

梵语是印度古典语言，仿照“汉学”一词，我在这里用“梵学”指称古典印度学。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深度和广度也就可想而知。

我与梵语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196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时，却告知我已被调到了东语系。而到了东语系，又把我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这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使我得以在季羨林和金克木两位教授亲自执教下学习了五年。在这五年中，我们不仅学会了梵文、巴利文和英文这些语言工具，也对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有了深切认识。尽管我对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的研究也怀有浓厚兴趣，但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强烈爱好。1965年学业结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进入研究所还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在“炼狱”中经受了痛苦的磨炼。因此，“文革”结束，能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倍感幸福。其实，在“文革”尚未正式结束之前，我们研究所在1973年就已开始非正式地恢复学术研究。冯至所长还亲自写信委托季羨林先生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殊不知当时先生尚未“解放”，我在北京大学一幢学生宿舍楼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这次“非同寻常”的问学，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 bibliography（目录学）入手。”这样，在此后几年中，我经常查阅和浏览国内外学者的梵学研究成果。由此，我也养成阅读书目的习惯，每年按照一定的经费额度，为图书室订购

梵学图书。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图书室收藏了从事梵学研究尤其是梵语文学研究的许多必备用书。

作为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我在那几年里读了不少书。不仅读梵语文学的书，也读有关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以及中国文史哲、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这是一种出于求知欲而无功利性的读书，当时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识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悦。它的实际效用要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会真正显现。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专精”和“博通”构成辩证关系，每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都会有自己的专长，但在知识结构上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

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轨后，我便开始撰写和发表梵语文学研究论文。在治学方法上，我自然而然会受到季羨林和金克木两位业师的影响。同时，我也自觉地向所内前辈学者学习，尤其是对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怀着敬仰的心情认真地读过。打通中外文学，打通人文科学，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应该努力追求的学术目标。如果说我是季羨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受业弟子”的话，那么，我也自认是钱锺书先生的“私淑弟子”。面对诸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我深知自己在一生的学术道路上，必须虚心又虚心，容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

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参加了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的梵语文学部分主要由我承担，季先生只撰写关于史诗《罗摩衍那》的一章。因为季先生当时刚刚完成这部史诗的翻译工作，并撰有《罗摩衍那初探》一书。我联想到季先生在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中，也是只撰写他本人做过深入研究的一些条目。然而，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对梵语文学的概况虽有所了解，但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才刚刚起步，发表的论文也有限。因此，严格地说，我还不适宜承担《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的撰写任务。但出于工作需要，我只能边干边学，撰写的主要方法是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注意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这次编写工作，我对梵语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梳理，加固了自己的梵学根基。

1987年至1991年期间，我承担了社科院重点项目《印度古典诗学》。在中国，向学术界介绍梵语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是金克木先生。早在1965年，他就为我们研究所编辑的《古典文学理论译丛》选译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而我在撰写《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理论》一章时，真切地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诗学宝库。从那时开始，我就注意收集和订购这方面的图书。在资料基本齐备的基础上，我用了两年时间认真阅读梵语诗学原著以及印度学者撰写的各种梵语诗学研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译出许多需要引用的梵语诗学原始资料。然后，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这部著作依据丰富的原始资料，描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和结构，对它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种种独特的批评原则、概念和术语做了认真的阐释。此书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艺美学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欢迎。

这部著作虽说有填补国内梵学研究中的学术空白的意义，但我决定从事这项研究也有现实的动因。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界出现比较文学热潮，并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这当然是美好的学术愿望。可是，在国内，东方诗学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所以，我发愿要写一部印度古典诗学著作，为中国的比较诗学提供一些资源。

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体验到印度古典诗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与中国和西方古典诗学迥然有别，但在文学原理上是相通的。我觉得各民族诗学中那些超越时空而相通的成分往往是文学理论的最可靠依据，代表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和基本原则，故而打通印度、中国和西方诗学，是一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基于这种想法，在完成《印度古典诗学》后，我准备“趁热打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实际上，我也已经尝试写了两篇论文：《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以及《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但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从1993年起，我接受了另一项学术任务，即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

已由季羨林先生译出。而《摩诃婆罗多》的规模更宏大，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号称有“十万颂”（现代精校本约为八万颂），篇幅为《罗摩衍那》的四倍。这项翻译工作原本由赵国华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共同承担。金克木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翻译体例，还亲自翻译了这部史诗的头四章，为我们示范。然而，不幸的是，赵国华英年早逝，甚至没有亲眼见到于1993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这样，出版社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主持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的遗愿，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这项工作也得到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项目。

从1993年我接手主持这项工作，直至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作为项目主持人，我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通稿工作，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随着工作的展开，岁月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既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检验，更是对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正如我在译后记中所说：“我有一种‘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一两年中，我全神贯注，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翻译。在这些日子里，《摩诃婆罗多》仿佛已与我的生命合二而一，使我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我能体验到淡化身外之物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而这种精神愉悦又能转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将之称为‘学问禅’，也就是进入了思维入定的‘三昧’境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了全书的翻译（约四百万字）。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精心编辑和印制，于2005年出版，贡献给国内学术界。

从学术上说，《摩诃婆罗多》起码有印度学和史诗学两方面的研究意义。在完成翻译工作后，我完全可以接下去对这部史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我决定还是回到我已放下很久的诗学课题上去，开始了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因为许多饶有兴味的诗学问题始终萦绕在心，激发我的研

究欲望。这项研究的预期成果分为两部分：一是译出几部梵语诗学名著，二是写出一部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专著。

这样，我先翻译梵语诗学名著，一鼓作气译出了《舞论》、《诗庄严论》、《诗镜》、《韵光》、《诗光》和《文镜》等十种，其中四种是选译，六种是全译。后来，它们结集为《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约八十万字），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出版。在完成翻译任务后，我进入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阶段。我先对中印古典诗学的文化背景进行思考，撰写了三篇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的论文：《历史和神话》、《宗教和理性》和《语言和文学》。就在这项比较诗学研究进入正题之时，我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现了转移。

当时，有一些青年学者愿意跟随我学梵文。我想到梵学研究资源丰富，而国内梵语人才稀缺，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担起培养后继人才这份责任。这样，我于2007年夏至2009年夏开设了一个梵语研读班。参加这个班的学员都已经具备梵语语法基础知识，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精读梵语原典。因为只有真正学会阅读梵语原典，将来才有可能独立从事梵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经过两年的学习，学员们觉得收获很大，并希望能将我们的教学成果保存下来，便于今后复习和参考，也为国内提供一部学习梵语的辅助读物。于是，在学员们的协助下，我编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所收篇目都是我讲课用作教材的梵语文学名著。读本内容包括梵语原文、汉语译文和语法解析三个部分。这部读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而就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执行这个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开设了一个学期为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关梵学各领域的研究计划。我一方面分担梵文班教学任务，另一方面主持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不仅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原典和古代汉译佛经，也对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近代以来，我国前辈学者都很器重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国内缺少梵语人才，这方面的研究始

终未能全面展开。现在，国内新一代梵文学者正在成长起来，已有可能全面开拓这一研究领域。这样，我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先后完成了《入楞伽经》、《入菩提行论》和《维摩诘所说经》三部佛经的梵汉对勘，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回顾我这一生，跋涉在梵学路上，乐在其中。这部《梵学论集》中所收论文，我是按照它们发表年代的次序排列的，呈现出一路走来的足印。我一步一步行走着，我的生命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是，梵学研究对我的吸引力依然丝毫未减。我还惦记着我的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希望自己能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告一段落后，再回到这个课题上来。

黄宝生

2012年6月

目 录

代 序	黄宝生 (1)
论迦梨陀婆的《云使》	(1)
《本生经》浅论	(15)
胜天的《牧童歌》	(27)
古印度故事的框架结构	(38)
印度古代神话发达的原因	(49)
《管锥编》与佛经	(62)
印度戏剧的起源	(68)
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	(81)
梵语文学修辞例释	(95)
禅和韵	
——中印诗学比较之一	(127)
在梵语诗学烛照下	
——读冯至《十四行集》	(142)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	(155)
佛经翻译文质论	(162)
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	(175)
季羨林先生治学录	(184)
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	
——读《梵竺庐集》	(199)
《故事海选》译本序	(205)
《摩诃婆罗多》译后记	(212)

《摩诃婆罗多》前言	(221)
神话和历史	
——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一	(241)
宗教和理性	
——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二	(251)
语言和文学	
——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三	(260)
《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导言	(276)
《奥义书》导言	(298)
《薄伽梵歌》导言	(309)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	(318)
《梵汉对勘〈入楞伽经〉》导言	(326)
《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导言	(345)
《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导言	(351)

论迦梨陀娑的《云使》

印度古代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传世之作有七部：抒情短诗集《时令之环》，抒情长诗《云使》，叙事诗《鸠摩罗出世》和《罗怙世系》，诗剧《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和《沙恭达罗》。其中，举世公认的两部代表作是《云使》和《沙恭达罗》。

关于迦梨陀娑的出生年代，印度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早到公元前八世纪，晚至公元后六世纪，差距可达一千四百年。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迦梨陀娑生活在印度笈多王朝，即公元四、五世纪。中国古代大作家，我们几乎都能考定他们的生卒年，不仅生卒年，有些还能考定生卒年月日。而印度古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无法考定他们的生卒年，倘能合情合理考定他们的生卒世纪，就算不错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史家脑子聪明，比印度文学史家善于考证，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古人的历史纪年观念比印度古人强，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种种可以据以考证的宝贵的历史纪年资料。这一点，印度学者也是谦虚地承认的，他们把中国古代高僧赴印求法的游记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看作重建印度古代历史的“不可缺少的史料”^①。

于是，也有些印度文学研究家试图通过探索中印文学因缘来考定印度古代作家和作品的年代，如印度著名梵文学者拉克文，曾试图将迦梨陀娑的《云使》与中国东汉诗人徐幹的《室思》进行比较，为考定迦梨陀娑的出生时代提供旁证（关于这个问题，留在本文最后部分细谈）。

^① N. K. 辛哈和 A. C. 班纳吉：《印度通史》（加尔各答，1955），第2章。

抒情长诗《云使》(Meghadūta)共有一百十一节^①,每节两联,每联两行。诗的内容是:有个药叉^②,玩忽职守,受到财神俱毗罗的诅咒,被贬谪一年。他谪居在南方罗摩山苦行林中,忍受与爱妻分离的痛苦,已有八个月。现在正是雨季来临的六月中,他看到一片由南往北的乌云飘上罗摩山顶,激起了他对爱妻的无限眷恋。于是,他向乌云献礼致意,托它带信:“云啊!你是焦灼者的救星,请为我带信,带给我那由俱毗罗发怒而分离的爱人。”^③他向乌云指点到达他爱人居住地阿罗迦城的路线:由这里往北,一路上要经过蚁垤峰、玛罗高原、芒果山、毗地沙城、优禅尼城、尼文底耶河、信度河、恒河、玛那莎湖等等许多地方。他对每一处的秀丽景色和旖旎风光,都作了富于感情的生动描绘。最后,便到了阿罗迦城(以上第一节至六十三节)。^④接着,他向乌云描述阿罗迦城里药叉们的欢乐生活,指出他家在阿罗迦城里的方位、标志,他爱妻的容貌;他想象他爱妻满怀离愁的种种情状;他委托乌云向他爱妻倾诉他的炽热相思,并安慰她说不久便可团圆。最后,他向乌云致谢,祝愿乌云和它的闪电夫人永不分离(以上第六十四节至一百十一节)。

这是印度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是一部独创性的作品。不过,印度有些学者在研究古典作品时,很注重探索作品主题和情节的出典,对

① 我这里依据的是印度文学院出版的《云使》编订本(新德里,1957)。自古以来,《云使》在印度各地流传很广,因而版本很多。各种版本的诗节数目不等,少至一百十节,多至一百二十一节。

② 药叉是印度神话里的一种小神仙。它们是财神俱毗罗的侍从,一般都具有善良可爱的性格,在《云使》中也是如此。但在印度佛教典籍中,有时被归入魔鬼一类。汉译佛经中亦译作“夜叉”,或意译为“能啖鬼”、“捷疾鬼”。因而,夜叉一词在中国是带有贬义的,如旧小说中称凶恶女子为“夜叉婆”、“母夜叉”。

③ 本文中的《云使》引文均采用金克木先生的汉译(《云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金克木先生的汉译是依据印度通行的摩利那特(约十四世纪)版本,共有一百十五节,比现在的印度文学院编订本多四节,即汉译本的第67、71、74、113节。

④ 摩利那特版本以此为界,将《云使》前半部分称为“前云”(Pūrvamegha),后半部分称为“后云”(Uttaramegha)。印度学者和《云使》注家一般都接受这种分法。但印度文学院《云使》的编者认为这种“前云”、“后云”的区分是后人添加的,理由是较早的《云使》注本没有这样的区分。

《云使》也是如此。他们查遍了印度古籍，例如发现在《梨俱吠陀》第十卷第一〇八首中，因陀罗派遣一只母狗寻找被妖魔偷走的牛；在《摩诃婆罗多》的插曲之一《那罗传》中，德摩衍蒂派遣天鹅向那罗表示爱情；在《本生经》故事第二九七则中，一个被国王处以死刑的人，委托一只乌鸦向他的妻子捎信，等等^①，但觉得这些都不像是《云使》的出典。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迦梨陀娑创作《云使》的灵感源泉是史诗《罗摩衍那》。其中，学者耶达沃的论证比较详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罗摩遭流放，药叉遭贬谪；二、罗摩流亡在山林中，药叉也谪居在山林中；三、罗摩的妻子悉达被妖魔劫走，罗摩与她分离一年；而药叉被财神诅咒，也与妻子分离一年；四、罗摩派遣神猴呵努曼寻找妻子，药叉委托雨云看望妻子；五、罗摩在雨季来临时特别思念妻子，药叉也是如此。此外，还列举了一些细微的“一致性”，如《罗摩衍那》中多次将神猴呵努曼比作云，《云使》中药叉想象妻子听完雨云的话后，“会像悉达望着呵努曼一样”；《罗摩衍那》曾将神猴比作山，《云使》也曾将雨云比作山；《罗摩衍那》曾将悉达比作细月、雌轮鸟、霜打的荷花，《云使》也对药叉的妻子用过这样的比喻，等等^②。但我似乎觉得，这是将两部作品各自的完整结构和形象拆散之后，所作的支离破碎的比附。在文学研究中，注意新旧文学作品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无疑是对的，但如果强调过了头，好似我国江西派诗人黄庭坚看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就容易低估伟大作家的创造性。江西派本身诗歌成就不高，吃亏就在此，他们“资书以为诗”，不懂得艺术贵在独创。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修养，对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作出独特而深刻的反映，即使是利用古已有之的题材，也是如此，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歌德的《浮士德》。如果作家脱离现实生活，从艺术构思直至语言表达，一味乞灵古人，毫无创新之意，那他是绝不会博得文艺女神的青睐，在艺术宫里占据一个显赫的席位的。

当然，独创或创新，也从来不是割断文学发展历史的凭空创造，而是

^① 详细参阅 B. R. 耶达沃《迦梨陀娑作品探源》（德里，1974），第74—83页。

^② 同上。